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 and World Order

壹、前言

自 2018 年美國發動了貿易戰後，美中是否掉入修昔底德斯陷阱(Thucydides's Trap)再次引起學術界關注，既有強權(great power)與崛起強權(rising power)是否會陷入一場無可避免的戰爭？國際關係學界對此亦有諸多討論：如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為首的攻勢現實主義學派認為基於無法把握國家的意圖，在理性評估相對權力的計算下，既有強權與崛起強權必然會陷入安全競爭中，戰爭將難以避免(Mearsheimer, J.J.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14)；而譚門(Ronald L. Tammen)等權力移轉論的學者則認為當崛起國的意圖是滿意時，即崛起國對於國際秩序現狀感到滿意時，就算國力追上既有強權時也未必會發動戰爭(吳玉山，2011，包宗和編)；Joshua R. Itzowitz Shiffrin 從戰略價值(strategic value)與軍事態勢(military posture)進行分析，並提出當既有強權具有高度戰略價值時，意即既有強權有成為崛起國盟友潛力的時候，崛起國將採取合作性政策，拉攏既有強權；反之則會採取掠奪性政策，削弱或取代大國。

有別於傳統現實主義的觀點，Goddard 的理論融合了現實主義與建構主義的概念，她認為儘管崛起國必然帶有修正主義的意圖(Goddard, S. E. 2018: 4)，然而這並非既有強權認定崛起國意圖的單一因素，而是依據崛起國合法性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ies)所展現出的意圖加以判斷(Goddard, S. E. 2018: 2)，此外，本書的另一項亮點在於 Goddard 認為談話或修辭(rhetoric)並非只是廉價的對話(cheap talk)，因為行動並不具有意義，崛起國行為的意圖透過這些話語顯現出來，當既有霸權國認為崛起國有改變現狀的意圖時，崛起國將遭受到遏制(containment)。

本書評以下將分為三個部分，首先將簡介合法性政治(politics of legitimacy)，第二將論述合法性政治，最後是筆者對 Goddard 理論的觀點與結論。

貳、何謂合法性政治

既有強權其實並不必然視崛起國為威脅，而是會聽其言，觀其行而作後動，

這使得崛起國如何正當化其行為的過程顯得重要且關鍵，也是本書最核心的論點，Goddard 在本書中所欲探討的現象是：既有強權如何看待崛起國的意圖並作出政策選擇，意即，既有強權國有多大程度接受崛起國合法化其行為的說法。在討論 Goddard 所建構的合法性政治以前，我們需要先瞭解本書的相關假設，主要有五個：第一，基於既有強權和崛起國均鑲嵌在社會之中，兩個行為者間的互動是戰略性，不能簡單地將合法化過程理解為追求自我利益；二，相較於建構主義學者，本書強調行為者更具戰略性而非社會性；三，本書的合法化更限縮在言辭和政治的關係，意即既有強權與崛起國之間的互動競爭和崛起國的談話（Goddard, S. E. 2018: 14）；四，基於崛起國的實力不斷提升，崛起國具有擴張主義的傾象與意圖，並追求改變現狀（Goddard, S. E. 2018: 4）；五，現存的國際秩序存有標準或規則去定義何謂合法的行為（Goddard, S. E. 2018: 18）。

崛起國的合法化過程之所以重要在於其釋放出的訊號，一旦崛起國合法化其行為後，將會產生三種效果：首先，可以傳遞出自我限制的訊號（*restrain signal*），因為當崛起國在國內避開了革命性的言論，則其對現狀發動大規模的改變就相對困難（Goddard, S. E. 2018: 22）；第二，建立脅迫性修辭（*rhetorical coercion*），透過宣稱與既有強權相同的原則或言論，使後者無法名正言順地對抗崛起國的行為，因為既有強權過去也曾經如此宣稱，換句話說，就是崛起國的修辭陷阱（*rhetorical trap*），迫使既有強權沒有正當理由動員起來遏制崛起國（Goddard, S. E. 2018: 24）；第三，展現崛起國的國家身份，透過國家發表的談話或演說與某一種國家身份產生連結（Goddard, S. E. 2018: 25）。綜上所述，當崛起國成功合法化其行為時，就可以享受到現有秩序和大國的支持，避免遭到大國的過度關注。然而言者雖有心，聽者卻未必有意，若崛起國希望避免與既有強權發生衝突，並合法化自己的行動，說服大國其行為合乎國際秩序，則需要滿足兩個關鍵因素：多元解釋性（*Multivocality*）與既有秩序的脆弱性（*I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

多元解釋性係指崛起國的對話能力，意即國家或其領導人具備同時與多個不同意識形態的族群對話的能力，換言之，崛起國所說的話能否被不同群體認同。

多元解釋性的重要性在於當崛起國提升相對權力時，能夠說服其他既有強權其擴張合乎既有秩序，同時滿足國內民意對於國家地位的追求。除了對話能力外，具備多元解釋性的另一要素在於該領導人是否能夠與不同意識形態的群體有身份連結（Goddard, S. E. 2018: 30-32），換言之，一個人的身份背景能夠增加其言論的可信度，例如一個國家宣稱出兵的理由是基於民主價值的維護，而這個國家的確具備良好的民主體制與公民社會，則該理由更能夠被大國所接受。此外，若崛起國不能滿足多元解釋性，則基於國內政治生涯的考量，領導人會傾向於滿足國內民意而非國際期望，因此更容易表現出民族主義或擴張主義的態度（Goddard, S. E. 2018: 33）。

有了崛起國所釋出的言論訊號後，能否被接受則仰賴聆聽的既有強權，Goddard 認為既有制度的脆弱性與強權的認知有關，而脆弱性的衡量則與兩個指標有關：一是既有的制度有沒有被普遍的強權所接受，越多國家接受，則脆弱性越低；二是既有強權有多大程度依賴於現有秩序，當國家的生命線或安全極度依賴時，脆弱性就越高（Goddard, S. E. 2018: 33-35）。脆弱性越高，代表既有強權對於自身的國家安全或影響力就會越不安，因此更容易感到恐懼，一旦威脅或盟友出現時，就更可能產生過度解讀的問題。

參、合法性政治的因果機制

至此我們基本介紹完 Goddard 提出合法化政治的概念與脈絡，而其因果機制則更為直觀，礙於篇幅本文僅介紹其中兩個脈絡：第一，當崛起國具備多元解釋性，而既有秩序處於高脆弱性時，意即既有強權則對自身的安全或影響力感到不安，而崛起國提到其願意遵守既有秩序的言論，傳遞出自我克制的訊號時，既有強權會傾向認為崛起國是可合作的，對於崛起國的言論產生強烈的信賴和共鳴（resonance），並確信崛起國所展現出的克制意圖，進而將其視為盟友（Goddard, S. E. 2018: 36-38），如圖 1 中第一象限所示。作者在第五章對 1938 年至 1939 年間德國的案例即展現此一分析：儘管凡爾賽體系（Versailles system）得到多數國家支持，但國際聯盟的職能與後續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的簽訂都顯示凡

爾賽體系在 1930 年代後期的脆弱性，以及正是希特勒在這段時期屏棄原先追求平等和民族自決的言論後，西方國家才放棄綏靖政策，並試圖遏制德國的擴張。第二，另一種相反的脈絡則是崛起國具備低多元解釋性，且既有秩序的脆弱性高的時候，意即崛起國更訴諸於國內的民族情緒和擴張主義，同時既有強權對現存秩序和安全感到不安時，大國會傾向擴張對崛起國的解讀，並確信崛起國是一個威脅而對其進行遏制或對抗，如圖 1 中第四象限所示。作者在第六章對 1931 年至 1933 年美日的案例分析展現此一脈絡：美國於戰間期由《四國公約》與《九國公約》所建立的華盛頓體系（Washington system）在 1930 年後受到其他大國對於海軍協議的挑戰，導致該制度的高脆弱性，加上日本以幣原喜重郎（幣原喜寿路）為首的民政黨（minseito party）無法整合國內民意，因而缺乏具備多元解釋性的能力，美國開始改變原本接受日本在滿洲國擴張的立場，並在 1931 年後對日本採取遏制政策。

圖 1

		Weak resonance		Strong resonance	
		<i>Great power believes legitimation unreliable, seeks additional information about intentions. May lead to infighting, policy paralysis. Hedging results.</i>		<i>Great power sees restraint, opposition is silenced, and sees rising power as partner. Accommodation is preferred strategy.</i>	
Rising power's multivocality	High				
	Low	Weak dissonance		Strong dissonance	
		<i>Great power reads legitimation strategies as weak signal of type. Relies on existing order—institutions and allies—to contain the rising power.</i>		<i>Great power sees challenger as revolutionary, hawks are emboldened, likely to see existential threat to normative order. Containment and confrontation are preferred strategies.</i>	
		Low			High
		Great power's institutional vulnerability			

資料來源：Goddard, S. E. (2018: 36)

肆、討論與結論

權力移轉係國際關係學界辯論的焦點之一，相較於傳統國際關係對崛起國與既有強權的互動側重於利益或傷害的計算，Stacie Goddard 聚焦在崛起國的合法化政治：一個崛起中的大國能否避免其他國家的對抗，取決於能否將本身的崛起與國際規範做連結，並說服其他大國。作者細膩地捕捉到強權之間的互動與意圖塑造之間的關係，提供不同的理論視野去探究什麼時候崛起國與既有強權之間更可能發生衝突。儘管如此，我認為本書仍然有兩個問題值得探討：第一，本書似乎忽略了崛起國有可能採取完全扞從或支持既有強權的情況，如同 Shiffrinson 在其書中所提到：崛起國可能因為既有強權的戰略價值或軍事態勢而選擇與其合作（Shiffrinson, J. R. I. 2018: 36），Goddard 在書中卻未探討到此可能性：第二，如同 Robert Ross 的看法，為何當崛起國具備多元解釋性時，既有強權會願意傾聽崛起國對外溫和的聲音，而非內對具有擴張主義意味的言論？（Ross, R. 2020: 157）畢竟很有可能崛起國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爭取發展時間，為何既有強權願意冒這樣的險呢？

儘管本書存在一些問題與疑慮值得更進一步的探討，然而不可否認，Goddard 確實替權力轉移的辯論帶來新的想法與思考，也值得未來研究大國政治和權力移轉的學術作品與之對話。

伍、參考文獻

Mearsheimer, J. J. 著，王義桅、唐小松譯，2014，《大國政治的悲劇》，臺北：麥田出版。譯自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2001.

吳玉山，2011，〈權力移轉理論：悲劇預言？〉，包宗和（編），《國際關係理論》，臺北：五南，頁 389-416。

Goddard, S. E. 2018. *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Ross, R. 2020. BEYOND THEORETICAL DETERMINISM: EXPLORING THE COMPLEXITY OF POWER TRANSITIONS.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2): 151–61.

Shiffrinson, J. R. I. 2018. *Rising Titans, Falling Giants: How Great Powers Exploit Power Shift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書名：*When Right Makes Might: Rising Powers and World Order*

作者：Stacie E. Goddard

出版者：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年份：2018

頁數：264

ISBN：9781501730313